

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王 迪

内容提要：硝石战争结束后，秘鲁社会冲突加剧、激进政治运动发酵以及新实证主义开始传播，促使开明的知识分子率先提出恢复土著人传统文化、维护土著人权益的土著主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重塑国家权威，秘鲁执政者将解决内陆山区土著居民的贫困与落后问题纳入战后重建的政治考量。随着时代的变迁，土著主义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知识分子对土著人生存困境的剖析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探索的解决方案也从最初的社会文化范畴延伸至政治经济领域，为统治阶层调整对土著人政策提供了推力。尽管秘鲁政府打着土著主义的旗帜先后推出了教育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和将克丘亚语确立为官方语言的政策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满足土著人的诉求，而是基于政治需要将其诉求刻意地放大或忽视。梳理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历史流变，不仅有助于认识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边缘化族群，也有利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为民族建构话语所掩盖的种族主义问题。

关键词：土著主义 硝石战争 边缘化 民族建构 种族主义

作者简介：王迪，上海大学文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1) 03 - 0104 - 22

“土著主义”（Indigenismo）既是关注美洲土著人历史传统的社会文化概念，也是探讨美洲国家历史进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概念。就秘鲁而言，以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áles Prada）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者率先反思在与智利争夺硝石产区的过程中，国家战败并走向崩溃的原因，进而提出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位、维护土著人权益的土著主义。^①

从官方视角来看，执政者基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塑政府权威、实现民族整合的长远考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土著主义思潮，将解决内陆山区土著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纳入政治考量。由于受到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该时期的知识分子坚信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公正，发展面向土著人的大众教育既可以在物质层面上使其获得维持生活的实践能力，又能从精神层面上培养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这种注入新实证主义养分的土著主义以国立圣马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为平台，向执政者发出政策建议的声音，直接推动了文官主义政府的教育改革。此后，以马利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为代表的土著主义者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土著人问题，主张消灭代表封建残余的大庄园制度，将土地分配给土著农民，恢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土著村社。由此，土著主义的内涵从社会文化范畴延伸至政治经济领域，这种历史流变为秘鲁政府调整土著人政策提供了推力。

土著主义作为维护土著人生存和发展权益的思想、政治运动，在国外史学界不无关注。然而由于它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相关研究关注视角也不尽一致。美国学者侧重于探究官方话语下的土著主义以及土著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例如，托马斯·M·戴维斯（Thomas M. Davies）

^① 从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开始，土著人就发起过维护自身独立发展道路、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1780—1782年的图帕克·阿马鲁（Túpac Amaru）起义由被认为具有印加王室血统的首长领导，他猛烈抨击殖民统治秩序，主张重返印加时代。实际上，此次起义具有捍卫印加文化传统、维护土著人权益的性质。但该运动被西班牙统治者残暴镇压，土著共同体因丧失种族权威而走向持久的衰落，相关的反抗运动归于沉寂，因此，我们无法将其视为土著主义在秘鲁的起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虽然没有组织过土著人起义，但是他以写作和在公众场合演讲的方式抨击执政者对土著人的剥削，进而提出改变土著人边缘化状况的政策主张。此外，在普拉达的影响下，以揭露安第斯地区土著人受到的奴役和虐待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始涌现，《无巢的鸟》成为美洲地区土著主义文学的先锋之作。参见 Thomas M. Davies, “Indian Integration in Peru, 1820 – 1948: An Overview”,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2, 1973, pp. 189–191; Jorge Coronado, *The Andes Imagined: Indigenismo, Society, and Moderni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9; Engenio Chang-Rodríguez, *La Literatura Política de Gonzáles Prada, Mariátegui y Haya de la Torre*, México: Ediciones de Andrea, 1957.

以考察秘鲁不同时期对土著人的政策为出发点，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虽然都认识到将土著人纳入到国家主流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族群的孤立状态。^① 玛丽亚·埃莱娜·加西亚（María Elena García）从多元文化发展的角度论及秘鲁的土著人，探讨了官方的教育政策在塑造土著公民方面的作用。^② 豪尔赫·科罗纳多（Jorge Coronado）从现代性的角度溯及土著主义，他将官方发展土著传统文化的过程视为建构“想象中的安第斯社会”并试图抵消殖民统治时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尝试。^③ 秘鲁学者马里索尔·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则从历史学和人种学角度入手，认为“文化”和“阶级”的话语虽然取代了“种族”的话语，但隐晦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霸权依旧笼罩着库斯科。^④

上述研究为关注秘鲁的土著主义提供了诸多线索与思路，但仍缺乏就该主题系统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秘鲁以恢复土著传统文化、维护土著人权益为取向的土著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简单的保护原住民的思想、政治运动，也不只是政府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表达，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与内嵌于秘鲁社会的种族、传统和文化的二元分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是为应对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尖锐化的种族冲突的求解，安抚、消解由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长期把持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对土著人带来的痛苦。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土著主义对秘鲁政府制定土著人政策以及构建对历史传统的科学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拙文拟从以上视角，尝试对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进行审视和探讨。

一 硝石战争与土著主义的兴起

任何一种思想、政治运动都有其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就秘鲁的土著

^① Thomas M. Davies, “Indian Integration in Peru, 1820–1948: An Overview”,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2, 1973, pp. 184–208.

^② María Elena García, *Making Indigenous Citizens: Identities,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Per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Jorge Coronado, *The Andes Imagined: Indigenismo, Society and Moderni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9.

^④ Marisol de la Cadena, *Indígenas Mestizos: Raza y Cultura en el Cusco*,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Marisol de la Cadena, “Silent Racism and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in Peru”, i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7, No. 2, 1998, pp. 143–164.

主义而言，在硝石战争中，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之间暴露出来的种族矛盾则是其主要根源。战争使长期垄断政权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陷入统治危机，他们在强制征召土著人参加战争的同时，继续实施剥削和奴役土著人的封建大庄园制度，引起底层社会的强烈不满。战争的失败将秘鲁推向崩溃的边缘，土著人发动的反对政府强制征税的起义、开明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的反思和执政者恢复统治秩序的需要共同推动了土著主义的兴起。

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曼努埃尔·帕尔多（Manuel Pardo）总统就注意到了土著人边缘化的问题，提出通过教育的方式整合土著人。然而，地方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官员担心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权威而提出强烈反对；天主教会声称，建立土著人与“腐败的”城市社会的联系将威胁土著人的“纯洁性”，对该计划同样不予支持。^①面对多重阻力，帕尔多提出的发展土著教育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其态度表明一些重要的文官政治家开始关注土著人并试图采取扶持措施。^②

1879年，秘鲁、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爆发硝石战争，智利因获得英国的支持而实力大增，秘鲁与玻利维亚则因军备落后、准备不足、组织不力等原因惨败。^③对秘鲁而言，硝石战争如同一场国家的灾难，被掩盖的种族冲突愈加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味维护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罔顾土著人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战争初期，面对智利的强势进攻，秘鲁将领安德烈斯·卡塞雷斯（Andrés Cáceres）率部队撤退至安第斯山区，动员受到入侵者劫掠的广大土著农民发起持久的抵抗运动。卡塞雷斯利用其能够讲克丘亚语的优势，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号召土著人保护自己的土地、赶走侵略者，迅速建立了由约5000名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伍。1882年7月，在曼塔罗峡谷，游击队发起猛烈的进攻，重挫智利军队，有效地牵制了敌方的军事行动。^④此后，越来越多的土著农民参与到武装斗争中，他们将自己视为“爱国者”，抨击向智利军队

^① Fredrick B. Pike, *The Modern History of Peru*,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pp. 135 - 137.

^② Thomas M. Davies, "Indian Integration in Peru, 1820-1948: An Overview",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2, 1973, p. 187.

^③ Heraclio Bonilla, *Un Siglo a la Deriva: Ensayos sobre el Perú, Bolivia y la Guerra*,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0, pp. 153-175.

^④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p. 240-241.

投降的文官政府。土著人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使上层社会感受到威胁，卡塞雷斯在同利马的政治精英达成秘密协议后，也一改与土著人结盟的立场，将矛头对准了曾给予其极大支持的盟友。在官方的策划下，土著人在游击战中抵抗智利军队的贡献被刻意抹杀。^①

战争结束后，土著人的社会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1885年年初，秘鲁北部安卡什区的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诺列加（Francisco Noriega）宣布对土著农民征收两索尔的人头税，使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土著人不堪重负。该地区的土著领袖佩德罗·巴勃罗·阿图斯帕里亚（Pedro Pablo Atusparia）率领其他24名土著人代表向诺列加提出减少人头税额并延期缴纳的申请，但却遭到拒绝，他们还被指控搅乱社会秩序，受到辱骂和严刑拷打。几天后，大量土著人在安卡什区首府瓦拉斯（Huaraz）集会，要求释放佩德罗及其他土著人代表，地方政府通过枪击予以回应。土著人与克里奥尔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4000~5000名土著人开始攻打瓦拉斯，他们夺取了该城市并释放了被监禁的土著领袖。^②虽然这场地方起义最终被调遣自利马的军队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平息，但却反映出内嵌于秘鲁社会结构之中的种族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尖锐化的程度。

大量土著人参与武装暴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土著人问题。他们批判秘鲁历史上对土著人持续的剥削，相信如果不处理好土著人问题，国家将永远受到暴动的威胁。一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官方对土著人的忽视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如果土著人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社会并建立起共同的民族认同，就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进而扭转战局。^③

^① Brooke Larson, *Trials of Nation Making: Liberalism,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Andes, 1810–19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8–187.

^② 相关著作参见 William W. Stein, *El Levantamiento de Atusparia: El Movimiento Popular Ancashino de 1885*, Lima: Mosca Azul Editores, 1988; Mark Thurner, *From Two Republics to One Divided: Contradictions of Postcolonial Nationmaking in Andean Peru*,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7; Patrick Husson, *De la Guerra a la Rebelión (Huanta, Siglo XIX)*, Lima: Centro de Estudios Regionales Andino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992; Jeffrey L. Klaiber,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Peru, 1824–1976*,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Félix Alvarez-Brun, *Ancash: Una Historia Regional Peruana*, Lima: Ediciones P. L. V., 1970; Jorge Basadre, *La Multitud, la Ciudad, y el Campo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Editorial Huascarán, 1947; François Bourricaud, *Poder y Sociedad en el Perú Contemporáneo*,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R, 1967. 相关论文参见 Mark Thurner, “Atusparia and Cáceres: Rereading Representations of Peru’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National Problem’”,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1997, pp. 409–441; William W. Stein, “Next to Nothing: More on Pedro Pablo Atusparia”,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 No. 2, 1998, pp. 307–315; Peter Blanchard, “Indian Unrest in the Peruvian Sierr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Americas*, Vol. 38, No. 4, 1982, pp. 449–462.

^③ Fredrick B. Pike, *The Modern History of Peru*,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pp. 159–160.

19世纪末期，以加强国家干预、反对压迫土著人为核心的新实证主义开始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卡洛斯·利松（Carlos Lissón）提出，懒惰、迟钝和酗酒等所谓的土著人特征并不是由种族“劣根性”造成的，而是由于其生活在狭窄空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土著人始终保持着在土地上勤勉工作的精神，应该团结土著人以推动国家的发展。^① 法学家马里亚诺·H. 科尔内霍（Mariano H. Cornejo）同样对种族决定论进行猛烈的批判，认为教育的不平等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对教育进行系统的干预，实施面向土著人、不具有性别歧视的普遍义务教育，培养土著人的实践技能，从而使其过上“能够维护权利和尊严的生活”^②。

作为重要的新实证主义者，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通过写作和公开演讲的方式为土著人发声。普拉达出生在富有的西班牙移民家庭，曾参加硝石战争并因战败被俘，智利军队结束对利马的占领后将其释放。普拉达在战斗中见证了穷苦土著人的英勇牺牲精神，批判国家长久以来对土著人的榨取性政策，决定将捍卫土著人权益作为其奋斗的事业。^③

1888年，普拉达在演讲中提出，统治阶层的分裂和国家对土著人的忽视导致了硝石战争的失败。他认为，在战争面前，秘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力量，“利马的统治集团由治理者、密谋者和冷漠者三种人组成，士兵集结在不同的政治团体下，没有将智利作为共同的敌人，因此，秘鲁不可能取胜。”^④ 他还强调，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不能代表整个国家，只有居住在安第斯山区、从殖民时期就受到忽视和奴役的广大土著人才能代表真正的秘鲁；地方法官、行政官员和教士相互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了土著人的发展。为了改变土著人的边缘化处境，普拉达呼吁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相信只有使土著人走出隔绝状态、真正融入社会，才能使秘鲁以“骄傲的胜利者”的身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⑤

普拉达以面向民众进行激昂演讲的方式获得关注，文学界也开始将视角

^① Carlos Lissón, *Breves Apuntes sobre la Sociología del Perú en 1886*, Lima: B. Gil, 1887, p. 45.

^② L. L. Bernard, “La Sociología Sistemática de Mariano H. Cornejo”,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4, No. 2, 1942, pp. 7-34.

^③ Luis Alberto Sánchez, *Don Manuel: Biografía de Manuel González-Prada, Precursor de la Revolución Peruana*, Santiago: Ediciones Ercilla, 1937.

^{④⑤} Manuel González Prada, *Páginas Libres*, Lima: Fondo de Cultura Popular, 1966, pp. 44-46, pp. 46-48.

聚焦土著人，以安第斯地区的土著农民为主要题材的土著文学悄然兴起。1883年10月，智利军队撤出首都利马，该城市随即展开大量的政治文化活动，抨击内陆省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地方寡头垄断政治权力、土著人长期受到压迫等问题。^① 19世纪末期，现实主义作家梅塞德斯·卡韦略·德卡沃内拉（Mercedes Cabello Llosa de Carbonera）开始关注土著女性群体，指责教育的不平等、父权制的长期压制和地方教会的腐朽堕落束缚了安第斯女性的自由发展，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霸权进行激烈的批判。^② 克洛林达·马托·德图内尔（Clorinda Matto de Turner）的代表作《无巢的鸟》以浪漫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土著人遭受奴役的悲惨生存状态，表达了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应帮助土著人融入社会的强烈愿望，开创了土著主义文学在美洲之先河。^③

19世纪末期土著主义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官主义政府出于恢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塑政府权威、实现民族整合的长远考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利用在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土著主义，将解决土著人贫困与落后的问题纳入政治考量。

面对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恢复经济秩序是当时的执政者亟须解决的问题。根据统计，1883年秘鲁的进口降至1840年的水平，以蔗糖、棉花、白银为主的出口降至战前的1/4，硝石和鸟粪的出口几乎全部丧失。金融系统也受到严重的破坏：20家主要银行经过战争的洗劫后所剩无几，政府为向债权人支付借款，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白银在该时期大量流失。^④ 原有的社会阶层同样受到巨大冲击，大资产所有者群体几乎被全部摧毁，中产阶层人数从2万多人降至2000余人，流浪者人数接近50万，整个国家陷入赤贫化。^⑤

政治冲突和种族矛盾是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战争末期，秘鲁军队关于如何结束战争产生严重的分歧，以米格尔·伊格莱西亚斯

① Lilly E. Escobar-Artola, *Clorinda Matto de Turner y Mercedes Cabello de Carbonera: Motivos Sociales y Filosóficos en los Comienzos de la Novela Peruana*, PhD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1992, pp. 1-40.

② Elena González-Muntaner, *Literatura Femenina en el Perú Decimonónico: La Cuestión del Naturalismo y el Feminismo en la Obra de Mercedes Cabello de Carbonera*, PhD Dissertation,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pp. 216-255.

③ Clorinda Matto de Turner, *Ave sin Nido*, Cuzco: Universidad Nacional del Cuzco, 1948; Francisco Carrillo, *Clorinda Matto de Turner y su Indigenismo Literario*, Lima: Ediciones de la Biblioteca Universitaria, 1967; Alberto Tauro, *Clorinda Matto de Turner y la Novela Indigenista*, Lim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1976.

④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p. 242-245.

⑤ Heraclio Bonilla, "The War of the Pacific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Problem in Peru", in *Past & Present*, No. 81, 1978, pp. 92-118.

(Miguel Iglesias) 为核心的主和派与智利军队积极接触, 推动停战协定《安孔条约》的签订, 以安德烈斯·卡塞雷斯将军为核心的抵抗派主张深入安第斯山区, 动员广大土著人, 展开与智利军队长期对峙的游击战争。^① 伊格莱西亚斯与卡塞雷斯之间的分歧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终止, 二者围绕政治权力再次展开激烈争夺, 国家随之走向分裂。被武装动员参加游击战争的土著人, 开始利用战乱反对长期剥削他们的白人大庄园主和梅斯蒂索监工, 通过集体占有土地的方式要求获得“战利品”。^②

上述因硝石战争而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种族冲突, 促使 19 世纪末期执掌政权的文官主义政治家反思并认识到因长期剥削土著人而导致秘鲁出现的畸形发展模式。统治阶层有意识地吸收在思想界兴起的土著主义, 推出整合土著人的“文官主义计划”。作为该计划的核心, 教育被视为使土著人融入社会、建立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为了发展土著教育, 大批的教师和官员被派往农村地区, 他们在土著村社开设班级, 教授读写和基本的算术知识, 更重要的是, 帮助土著人学习西班牙语, 打破其融入主流社会的语言障碍。除此之外, 文官主义政府逐步建立了安第斯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 试图改善土著人的卫生条件, 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③

毋庸置疑, 19 世纪末期的“文官主义计划”是统治阶层借助土著主义, 以教育和医疗卫生为切入点, 探索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位的重要尝试。但值得注意的是, 执政党尚未将土著人的生存困境作为要着力解决的政治议题, 推出的“文官主义计划”也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失去连续性。因此, 该计划对土著人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为 20 世纪上半叶土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 政治运动与土著主义的话语转变

20 世纪初, 秘鲁经济现代化加速发展, 国内外垄断资本为开发自然资源而深入内陆地区, 对土著人的居住环境造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 种族主义

^① Jorge Basadre Grohmann,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del Perú, 1822-1933, Tomo 9*, Lima: Producciones Cantabria S. A. C., 2014, pp. 260-300.

^② Florencia E. Mallon, *The Defense of Community in Peru's Central Highlands: Peasant Struggle and Capitalist Transition, 1860-194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80-125; Nelson Manrique, “Los Movimientos Campesinos en la Guerra del Pacífico”, en *Allpanchis*, Vol. XI, No. 11-12, 1978, pp. 71-101.

^③ Carlos Contreras, *Maestros, Mistis y Campesinos en el Perú Rural del Siglo XX: Documento de Trabajo N. 80*,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96, pp. 6-12.

在利马克里奥尔精英阶层中再次抬头，他们漠视土著人的诉求，为地方精英垄断土著人事务提供可乘之机。面对国家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土著人问题，一方面，以佩德罗·苏伦（Pedro Zulen）、多拉·马耶尔（Dora Mayer）和华金·卡佩洛（Joaquin Capelo）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创建“维护土著居民协会”，对土著人的生存困境展开全方位的实地调查；另一方面，以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和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为代表的土著主义者从政治经济视角剖析土著人问题，促使土著主义从作家笔下的文学话语转变为大众所熟知的政治话语。

1895—1919年是秘鲁历史上的“贵族共和国”时期，文官主义精英在沿海地区的商人、银行家和内陆省份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共同支持下，实行初级产品出口的现代化发展战略。^①有利的国际市场和开放的国内政策推动秘鲁经济快速增长，1905—1915年期间贸易增长率达475%，1907年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进口。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只要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就可以维持国家的繁荣。^②

伴随着经济现代化，权力和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与出口贸易紧密联系的寡头集团手中，他们漠视土著人要求维护生存和发展权益的呼声，奉行针对土著人的种族主义，认为只有“梅斯蒂索化”才是拯救土著人的出路。^③19世纪末期，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大批外国资本迅即涌向秘鲁的亚马孙雨林地带，土著人被迫从事高强度作业，意外事故频发。^④由于发展经济是执政者的首要考虑因素，对与土著人有关的抗议置之不理，地方精英借机垄断土著人事务，侵占土著

① “贵族共和国”一词首次出现在秘鲁历史学家豪尔赫·巴萨格雷·格罗曼（Jorge Basadre Grohmann）的《秘鲁共和国史》第11卷，指1895—1919年间，位于利马的寡头集团在经济上奉行依赖外资的初级产品出口政策、在政治上通过操纵选举以维护政权的特殊历史时期。参见 Jorge Basadre Grohmann,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del Perú, 1822-1933, Tomo 11*, Lima: Producciones Cantabria S. A. C., 2014, p. 51; Sinesio López J., “El Estado Oligárquico en el Perú: Un Ensayo de Interpretación”,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40, No. 3, 1978, pp. 991-1007; Natalia Sobrevilla Perea, “Elecciones y Conflicto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en *Elecciones*, Vol. 10, No. 11, 2011, pp. 9-32.

② Fredrick B. Pike, *The Modern History of Peru*,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p. 182.

③ 梅斯蒂索化，一般指不同种族和文化族群之间通过“通婚”而实现的一种混合。就秘鲁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少数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精英分子主张土著人与白人通婚，从而消减土著人的种族“劣根性”、推动国家的发展。此外，“梅斯蒂索化”还被赋予关于民族认同的内涵，人们认为梅斯蒂索人比土著人更容易被同化和吸收，是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路径。参见 Deborah Poole, *Vision, Race, and Modernity: A Visual Economy of the Andean Imag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2-183.

④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 265.

村社的土地。以哈维尔·普拉多（Javier Prado）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声称土著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应通过种族融合为国家注入“新鲜的血液”，这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论调被主流社会吸收，为寡头执政者剥削土著人提供理论辩护。^①

统治集团对土著人的忽视和少数种族主义者的偏见没有掩盖经济繁荣背后的土著人问题。20世纪初期，青年学生佩德罗·苏伦、新闻记者多拉·马耶尔和社会学家华金·卡佩洛共同创建“维护土著居民协会”并吸纳了全国范围的土著主义者，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关注土著人的生存困境。

受到国际废奴组织的启发，“维护土著居民协会”试图走进土著人的村社和工作场所，通过调查和采访的方式揭露该族群受到的奴役和剥削，从而实现改变民众的狭隘认知、维护土著人权益的目的。^②事实上，面对不公正的对待，土著人曾尝试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语言的障碍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勾结使他们逐渐丧失希望。面对这一问题，“维护土著居民协会”组织律师参与相关诉讼纠纷，为土著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以捍卫其权益。^③

1912年，“维护土著居民协会”的成员库内奥·比达尔（Cúneo Vidal）赴秘鲁北部的奇卡马峡谷，调查在一场蔗糖种植园的罢工过程中有150名工人离奇死亡的情况。随后，他撰写报告《奇卡马罢工：奇卡马发生的事件及应采取的措施》，并将其发表在1912年10月10日的《新闻报》（*La Prensa*）。^④该报告揭露了大庄园主对土著人的残忍杀害，在利马社会引起极大震动。作为协会的秘书长，苏伦赴秘鲁南部的普诺省考察大庄园制度，了解到该地区的大庄园主侵占土著村社集体土地的问题。1915年9月，苏伦向丘奎托（Chucuito）的土著人发表演讲，鼓励他们维护“历史以来便为土著人所享有”的土地权益。^⑤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以秘鲁的封建主义为斗争目标，认为残存的封建势力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在其官方刊物《维护土著居民之责任》（*El Deber Pro - Indígena*）的第一期，苏伦指出，“秘鲁即将独立100周年，然而我们国家仍有

^① Margarita Zegarra Flórez, “Dora Mayor, los Indígenas y la Nación Peruana a Inicios del Siglo XX”, en *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 Vol. 66, No. 1, 2009, pp. 251-288.

^② Carlos Arroyo Reyes, *Nuestros Años Diez: La Asociación Pro-Indígena, el Levantamiento de Rumi Maqui y el Incaísmo Modernista*, Buenos Aires: Libros en Red, 2005, pp. 14-15.

^③ Jorge Basadre Grohmann,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del Perú, 1822-1933, Tomo 13*, Lima: Producciones Cantabria S. A. C., 2014, p. 27.

^④ Carlos Arroyo Reyes, *Nuestros Años Diez: La Asociación Pro-Indígena, el Levantamiento de Rumi Maqui y el Incaísmo Modernista*, Buenos Aires: Libros en Red, 2005, p. 16.

^⑤ Pedro S. Zulen, “Discurso a los Indios de Chucuito”, en *La Crónica*, 9 de febrero, 1915.

大量的农奴、家奴、非法的代理人和监工。土著村社的土地因长期被侵占而成为别人的种植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不得不为别人劳作，鞭笞、拷打和监牢都是为奴役土著人而设立的。封建主义远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失，因为它还残存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在这里，这个具有众多奴隶的国家被称为‘秘鲁共和国’。”^① 在刊物第二期，卡佩洛补充苏伦的思想，进一步揭露秘鲁社会的封建性，认为国家的独立没有改善土著人的境况，相反，土著人遭到的压迫和剥削比殖民地时期更为严重。“除了利马和部分沿海城市，整个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在很多矿区和大庄园，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榨取性政策依旧存在，只不过改变了名称而已，米达制、分摊制、义务劳动、强制劳动……”^②

在揭露秘鲁社会中腐朽的封建势力的同时，“维护土著居民协会”将矛头指向代表帝国主义资本的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CPMC）。该公司在实施地下开采的过程中，因为安全防护措施不足导致矿难频发，土著矿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③ 该协会一方面批评劳工代理人的非法行径，认为他们在土著人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将其诱骗至矿区，违背了土著人最起码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抨击外国资本为逐利而无视矿工的安全。马耶尔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撰写《黄皮书手册》，将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的斑斑劣迹公布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④

除了抨击内陆地区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资本对土著人的剥削外，“维护土著居民协会”也关注农村地区的社会冲突问题。1915年12月初，南部城市阿桑加罗（Azúgaro）爆发了数以百计的土著农民武装反抗大庄园主的起义。^⑤ 为了恢复统治秩序，地方军队射杀了数十名土著人，但事件并没有就此

^① Pedro S. Zulen, “¿Cómo Celebraremos Nuestro Centenario?”, en *El Deber Pro - Intígena*, No. 1, octubre de 1912.

^② Helmut Scheben, “Indigenismo y Modernismo”, en *Revista de Crítica Literaria Latinoamericana*, Vol. 5, No. 10, 1979, pp. 115-128.

^③ Dirk Kruijt and Menno Velling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ning Enclaves in Peru”, in *Boletín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y del Caribe*, No. 23, 1977, pp. 97-126.

^④ Margarita Zegarra Flórez, “Dora Mayor, los Indígenas y la Nación Peruana a Inicios del Siglo XX”, en *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 Vol. 66, No. 1, 2009, pp. 261-268.

^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口经济的繁荣促使地方土地所有者不断蚕食土著村社的土地，从1876年到1915年，阿桑加罗的大庄园从176个增至611个。为了夺回失去的土地，土著人曾展开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参见 Alberto Flores Galindo, *Arequipa y el Sur Andino: Ensayo de Historia Regional (Siglos XVIII - XX)*, Lima: Editorial Horizonte, 1977; Augusto Ramos Zambrano, *Rumi Maqui: Movimientos Campesinos de Azúgaro (Puno)*, Puno: Centro de Publicaciones IIDS-UNA, 1985; David Ruelas Vargas, “Los Movimientos Indígenas y la Educación del Siglo XX en el Sur Andino Puneño Peruano”, en *Revista 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Latinoamericana*, Vol. 21, No. 33, 2019, pp. 61-85.

平息，相关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1916年。^①“维护土著居民协会”密切关注该地区土著人的行动，发布《特别通讯》（*Boletín Extraordinario*）进行跟踪报道。《特别通讯》负责人马耶尔认为，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肆无忌惮地蚕食土著农民土地的行径引发了这场起义，土著领袖提出的重建印加帝国、消灭封建制度的口号很可能掀起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她呼吁执政者重视土著人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以维持社会秩序。^②

如果说“维护土著居民协会”以实地调查和批评报道的方式将土著人问题带入公众视野，那么马利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则通过撰写书籍和创建政党，彻底实现了使土著主义从文学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

马利亚特吉作为政治思想家，将马克思主义与秘鲁国情相结合，指出土著人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在他看来，独立革命没有使原来的地主阶级失去传统优势，他们伪装成共和派资产阶级，保留了封建经济制度。“尽管我国宪法在理论上规定了自由主义，尽管实际上也需要发展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农村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得到了加强和扩大。”^③马利亚特吉认为，只有完成独立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铲除殖民地时期的毒瘤，才能解决土著人问题。从彼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表现是酋长统治、大庄园和农奴制度，三者相互结合，使地主阶级全方位支配土著人。从印加帝国时期开始，土著人就被以“村社”为单位组织起来。国家独立之后，大庄园对“村社”的逐步剥夺和吞并，一方面使土著人更深地陷入农奴制，另一方面部分地破坏了维持着他们古老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④面对大庄园制和农奴制对土著人的剥削，酋长利用其传统权威进行合法性辩护，使保护土著人的立法无法付诸实施。

1926年，马利亚特吉创建革命刊物《阿毛塔》，主张用理论和科学观点分析秘鲁社会的问题。在克丘亚语中，“阿毛塔”指学者、导师和伟大的教士，用该词为刊物命名表明他对土著人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印加思想的崇敬。^⑤这一时期，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外资的涌入促使安第斯地区经历了巨大的

^① Carlos Arroyo Reyes, *Nuestros Años Diez: La Asociación Pro-Indígena, el Levantamiento de Rumi Maqui y el Incaísmo Modernista*, Buenos Aires: Libros en Red, 2005, pp. 88-141.

^② Dora Mayer, “La Situación en Puno”, en *El Deber Pro-Indígena*, No. 40, enero de 1916.

^{③④} [秘]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著，白凤森译：《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5页，第57页。

^⑤ Jorge Felipe Coronado, *Displaced Modernities: Poetry and Politics in the Andean Avant-garde*,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pp. 32-77.

变革，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种族分裂加剧，马利亚特吉试图在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复兴印加文化，重构民族认同。^①为了解决土著人的土地问题，他主张土著人与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展开维护自身权益的革命斗争。^②

同时期，秘鲁另一位重要的土著主义者阿亚·德拉托雷在吸收普拉达和马利亚特吉的土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政治运动解决土著人的困境。1923年，阿亚担任利马学生联盟的领袖并在同年的“学生—劳工联合抗议”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莱基亚（Augusto Leguía）总统担心阿亚具有煽动民众、破坏社会稳定的危险而将其驱逐。^③流亡国外期间，阿亚正式展开维护土著人权益的运动。1923年，阿亚在哈瓦那发表演讲，“我无法在平静中提起秘鲁的土著人，而只有谴责和抗议。那些真正到过荒凉的安第斯山区的人才可以感受到土著民众的忧郁和悲伤，他们受到长达400年的奴隶制度的压迫，如今仍生活在穷苦之中。”^④1925年，他又写到，“我确信，如果不直面土著人的经济问题，就不能恢复土著人的活力，也无法给予他们正义。土著人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是工人、士兵、生产者，是民族的脊梁。土著人问题是秘鲁的基本问题，我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⑤

1924年，阿亚在墨西哥创建阿普拉党，将解决土著人问题作为主要目标。1931年，阿亚在《立即行动计划》中阐述了关于解决土著人问题的基本设想，“制定保护土著村社的法律，推动小型土著工业和手工业发展，确立协调土著人与地主关系的指导方针，建立农村土著学校并使用土著语言和西班牙语进行双语教学，发起反对土著人酗酒和吸食古柯的运动，重新分配土地以创造土著自耕农阶级。”^⑥

针对土著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阿亚提出了涉及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多个方面的行动纲领，促使土著人问题从抽象的种族和道德范畴进入具

^① Julio Cotler, *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5, pp. 179-211.

^② Geraldine Skinner,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eruvian Socialist Movement”,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43, No. 4, 1979, pp. 447-471.

^③ Thomas M. Davies, “The Indigenismo of the Peruvian Aprista Party: A Reinterpretation”,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71, pp. 626-645.

^{④⑤}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Por la Emancipación de América Latina: Artículos, Mensajes, Discursos (1923-1927)*, Buenos Aires: M. Gleizer Editor, 1927, p. 43, p. 124.

^⑥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Política Aprista*, Lima: Editorial-Imprenta Amauta, S. A., 1967, pp. 23-24.

体的政治经济领域。作为不断发展壮大的政党，阿普拉党通过长期的舆论宣传与实际行动关注、解决土著人问题，这不仅使土著主义成为为秘鲁社会所熟知的政治话语，也为其他政治家思考土著人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 教育改革与土著主义的运用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土著人问题再次成为执政者关注的重要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上涨，农村经济走向商业化并与城市经济产生密切联系。地方精英为追逐利益，强占小土地所有者和土著村社的土地，促使农村社会的矛盾走向尖锐化。^①从政治角度看，秘鲁政府忌惮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害怕被动员起来的土著大众会威胁自身的既得经济利益，同时试图发挥国家机器的作用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②1939年，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y Ugarteche）在左翼政党阿普拉党的支持下，当选秘鲁第50任总统。他提出“治国之道在于教育”的执政理念，将土著主义运用到教育领域，以期整合土著人。

早在参加竞选运动时，普拉多就论及土著人问题。他说，“土著人是我们国家遗忘的人，从殖民时期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如果秘鲁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打破这种束缚。”^③当选总统后，普拉多立即展开行动，1940年2月，他在阿普里马克（Apurímac）、阿亚库乔（Ayacucho）、卡哈马卡（Cajamarca）、库斯科（Cusco）、胡宁（Junín）和普诺（Puno）各设立一所师范学校，为发展土著教育提供储备力量。^④1940年，国家教育预算超过10亿索尔，达到秘鲁历史最高水平。^⑤

^① G. Antonio Espinoza, “The Origins of the Núcleos Escolares Campesinos or Clustered Schools for Peasants in Peru, 1945–1952”, en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Americanistas*, No. 4, 2010, p. 4.

^② Gonzalo Portocarrero Maisch, *De Bustamante a Odría: El Fracaso del Frente Democrático Nacional, 1945–1950*, Lima: Mosca Azul Editores, 1983, pp. 20–31, pp. 46–49.

^③ Manuel Prado, *Un Año de Gobierno: Discurso de Manuel Prado*, Lima: El Universal, 1941, pp. 347–414.

^④ Manuel Prado, “Mensaje Presentado al Congreso por el Señor Doctor Don Manuel Prad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8 de diciembre, 1939.

^⑤ Thomas M. Davies, “Indian Integration in Peru, 1820–1948: An Overview”,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2, 1973, p. 203.

在普拉多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土著教育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① 1939—1942年间，农村师范学校从1所增至10所，培养的教师达600余名；到1944年农村师范学校已达29所，专项预算共计90万索尔。^② 与此同步，普拉多积极推动成年土著人教育的发展，创建隶属于教育部的“土著文化服务队”，并颁布大量的土著教育法规。1945年，“土著文化服务队”共开设7196个识字教学班，将近50万人登记入学，较大程度地提升了土著人的整体识字水平。^③

除了在教育领域采取行动外，普拉多也试图在其他方面维护土著人的权益。为解决地方诉讼纠纷，政府设立针对土著人的法律援助机构，推动超过400个土著村社获得地方部门的认可。^④ 二战期间，普拉多强制征收部分为德国、日本移民所有的地产并分配给土著人，废除对土著村社的征税以减轻其经济负担。^⑤

事实上，尽管土著人贫困与落后的问题已经为秘鲁民众所知，知识分子对如何解决该问题却并未达成一致，特别是对于梅斯蒂索化，即种族和文化上的混合，存在很大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土著人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将“梅斯蒂索化”视为消减土著人的种族“劣根性”、追求社会进步、实现民族整合的有效途径，持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何塞·乌列尔·加西亚（José Uriel García）；另一部分人则将“梅斯蒂索化”视为一种“堕落”，认为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的混合将影响土著文化的纯洁性，他们主张重估印加文明的历史价值，通过建构想象中的、完美的印加帝国，论证土著遗产对形成现代秘鲁民族的关键作用，持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Luis E. Valcárcel）。^⑥ 两大阵营就如何解决土著人问题的激烈辩论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巴尔卡塞尔因其观点更符合执政者的需要而获得重视。

① 普拉多曾两次担任秘鲁总统，第一次总统任期为1939年12月到1945年7月，第二次总统任期为1956年7月到1962年7月，此处以教育作为执政重心指的是第一任期。

②③ Manuel Prado, “Mensaje Presentado al Congreso por el Señor Doctor Don Manuel Prad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28 de julio, 1942, 1945.

④ Thomas M. Davies, “Indian Integration in Peru, 1820–1948: An Overview”,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2, 1973, p. 205.

⑤ Manuel Prado, “Mensaje Presentado al Congreso por el Señor Doctor Don Manuel Prad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28 de julio, 1941.

⑥ Marisol de la Cadena, “Silent Racism and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in Peru”, i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7, No. 2, 1998, pp. 143–164; Antoinette Molinié, “La Resurrección del Inca: El Papel de las Representaciones Indígenas en la Invención de la Nación Peruana”, en *Crónicas Urbanas*, Issue 11, 2006, pp. 77–92.

巴尔卡塞尔作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土著人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十分关注土著人的边缘化状况，曾加入“维护土著居民协会”，深入土著人聚居的村社展开实地调查。巴尔卡塞尔崇尚安第斯地区的农业集体主义，认为这是源自印加帝国的优良制度，应该给予支持和保护。^①他反对改变或者“同化”土著人，而是倡导利用教育加强土著人与社会的联系，培养他们对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意识。^②1945年，巴尔卡塞尔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关于“土著主义”的主张从知识分子话语走向国家官方政策领域。

同时期，美国政府试图扩张其在西半球的影响、遏制轴心国的渗透，开始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创建“美洲事务办公室”（OIA），通过实施援助项目以维持拉美国家的社会稳定。1945年，美国与秘鲁两国政府正式启动教育合作计划，双方分别出资17.2万美元和8.2万美元筹建“农民教学中心”，巴尔卡塞尔被任命为该计划的秘方负责人。^③

在巴尔卡塞尔的组织和宣传下，很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土著主义者参与到“农民教学中心”的初期筹备与建设工作中，其中包括文学家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历史学家何塞·巴萨德雷（José Basadre）和教育家埃米利奥·巴兰特斯（Emilio Barrantes）。^④“农民教学中心”为土著主义者提供了将思想付诸实践的平台，他们呼吁通过教育培养土著人的民族意识，缓和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之间的种族冲突。阿格达斯坚信识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强制使用西班牙语教学会引起学生的反感，“用克丘亚语进行扫盲教育是策略问题，是方法有效性问题”^⑤。巴兰特斯提出，教师应该成为农村地区的领导者，在帮助土著人提升思想文化水平的同时，推动农村

^① Tracy Lynne Devine, “Indigenous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in Peru: Indigenismo, Educ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in State Discourses”,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8, No. 1, 1999, pp. 63–74.

^② Emilio Morillo Miranda, *La Luz Apagada: Un Siglo de Políticas Educativas*, Lima: Ediciones Mendoza Chong Long, 1994, p. 36.

^③ G. Antonio Espinoza, “The Origins of the Núcleos Escolares Campesinos or Clustered Schools for Peasants in Peru, 1945–1952”, en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Americanistas*, No. 4, 2010, pp. 6–8.

^④ Jorge P. Osterling and Héctor Martínez, “Notes for a History of Peruvian Social Anthropology, 1940–1980”,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4, No. 3, 1983, pp. 343–360; José Luis Rénique, *Los Sueños de la Sierra: Cusco en el Siglo XX*, Lima: Centro Peruano de Estudios Sociales, 1991, p. 169.

^⑤ Carlos Contreras, *Maestros, Mistis y Campesinos en el Perú Rural del Siglo XX: Documento de Trabajo No. 80*,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96, pp. 22–24.

社会的稳定发展。^①

教育合作计划从1945年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对土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而言，“农民教学中心”坐落在土著人口密集的地区，由15~20所学校组成，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学校是主校，其余的学校则属于分校。主校的授课范围涵盖一年级到五年级，而分校通常仅提供一、二、三年级的课程，主校的教师需要定期到分校就教学情况展开督查。^② 根据可查阅的资料，1952年秘鲁共有22个农民教学中心，登记注册的学生有3.7万人；到1960年，农民教学中心的数量已达73个，登记注册的学生达20万。^③ 在实施该教育计划的过程中，大量土著主义者参与到教学工作中，他们既向土著人普及社会文化知识，又向执政者反馈地方社会的诉求，加强了土著人与主流社会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社会冲突。

应注意到，无论是曼努埃尔·普拉多实施的土著教育计划还是后来在美国的援助下开展的“农民教学中心”项目，始终没有直面土著人最关切的土地问题。地方寡头势力对土地的垄断、梅斯蒂索监工对土著人的剥削和地方精英对土著村社土地的蚕食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已经成为牵制安第斯社会发展的顽瘴痼疾。当暂时得到缓和的社会经济矛盾因形势的变化而再次走向尖锐化时，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采取激进的变革措施，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土著人问题。

四 贝拉斯科军政府与土著主义的激进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秘鲁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愈加凸显，主要表现为城市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农业部门的占比持续下滑，由此引发社会危机。^④ 贝拉斯科军政府为解决桎梏农村发展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采取激进化的土著主义立场，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实施双语教育

^① Emilio Barrantes, “Conceptos Fundamentales sobre la Educación del Indio”, en *América Indígena*, Vol. IV, No. 1, 1944, pp. 49–54.

^② G. Antonio Espinoza, “The Origins of the Núcleos Escolares Campesinos or Clustered Schools for Peasants in Peru, 1945–1952”, en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Americanistas*, No. 4, 2010, p. 7.

^③ Rolland G. Paulston, *Society, Schools and Progress in Peru*, New York and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1, p. 74.

^④ Ute Schirmer, “Reforma Agraria y Cooperativismo en el Perú: Cambios Estructurales y Contradicciones de la Nueva Política Agraria del Gobierno Militar del Perú”,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3, 1977, pp. 799–856.

改革推动国家的发展。

秘鲁作为农业大国，有将近一半的经济活跃人口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活动，农业的衰退激化了既有的社会冲突。一方面，大庄园主变本加厉地剥削土著人并侵占土著村社的土地，迫使濒临破产的农民采取集体抵抗的方式与其展开持久的斗争；另一方面，部分失去土地的土著农民为谋求生存而迁居城市，但城市无法吸纳庞大的农村人口，致使他们沦落为流浪者，成为统治阶层担忧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期，秘鲁政局开始恶化。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在1963年竞选总统时，宣称要改变内陆地区土著人的边缘化问题，并与国际石油公司（IPC）就开采权限问题进行谈判。^①然而，在他担任总统的5年中，土著人的贫困化并没有得到缓解，农村社会围绕土地而产生的冲突反而加剧；其所承诺的与国际石油公司的谈判迟迟没有展开，而他与该公司的私人联系则见诸报端。《商报》作为举足轻重的报纸，成为激进分子的舆论阵地，他们主张将国际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并发起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②同时期，阿普拉党开始积极活动，民众要求该党领袖阿亚当选总统的呼声不断增高。^③

在政治危机频发的时期，秘鲁武装力量同样经历了转变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秘鲁军官主要来自上层阶级，他们是维护寡头统治秩序的坚固堡垒。随着教育的发展和阶级流动性的加强，到20世纪60年代，中下阶级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其政治立场从保守走向进步，开始拥护社会变革。^④该时期，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C. 斯特潘（Alfred C. Stepan）的“新专业精神”在军队中广泛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斯特潘认为，在分析国家安全问题上，应改变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传统视角，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高，安全就越能得到保证，因此，军队应通过推动发展以维护国家安全。^⑤

^①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p. 393-409.

^②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 407; Adalberto José Pinelo, *The Na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in Peru: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s an Actor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PhD Disserta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1972, pp. 193-206.

^③ Iñigo García-Bryce, *Haya de la Torre and the Pursuit of Power in Twentieth-Century Peru and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8, pp. 125-164.

^④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 410.

^⑤ Alfred C.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17-157.

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社会进入高度组织化的状态。与之对比的是，秘鲁政府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频频遇挫，外国资本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社会冲突此起彼伏。面对混乱的局面，秘鲁武装力量认为有必要发挥监管国家、维护安全的作用，以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为首的军官在1968年发动了推翻贝朗德政府的军事政变。

贝拉斯科革命政府上台执政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广大土著农民与地主寡头之间的土地冲突问题。由“40个家族”组成的寡头集团长期蚕食土著农民的土地并维持残酷的剥削制度，迫使土著人掀起反抗运动。^① 革命政府将土著人问题视为经济问题，采取激进的土著主义立场，试图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解决困扰秘鲁已久的社会矛盾。^② 1969年6月，贝拉斯科签署的土地改革法开始实施。根据该法令，沿海地区超过50公顷、内陆地区超过30公顷的大庄园土地均被强制征收，并分配给受雇在这些庄园中长期劳作的土著人。截至1975年，全国50%的土地被分配给37.5万个家庭，打破了地方寡头对土地的垄断，有效地缓和了农村地区日益尖锐的矛盾。^③

面对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之间的种族冲突，贝拉斯科政府奉行革命民族主义，主张用“农民”取代“土著人”，建立各阶级之间的联盟。他在电视演讲中说，“今天是土著人日、农民日，革命政府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颁布法律终止使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农民不得不在别人土地上进行劳动的制度，永久终结压迫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正。……《土地改革法》为属于土著村社的绝大多数农民提供支持。从今天起，让我们放下让人难以接受的种族主义称呼，……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现在以图帕克·阿马鲁永恒自由的名义说：‘农民们，地主再也没有办法使你们变得贫穷！’”^④

将土著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进行教育改革。贝

^① Carlos A. Astiz, *Pressure Groups and Power Elites in Peruvian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49–65; François Bourricaud, *Power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Peru*, New York: Praeger, 1970, pp. 39–40.

^② Peter F. Klarén, *Nación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4, p. 415.

^③ José María Caballero, “Sobre el Carácter de la Reforma Agraria Peruana”, e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 No. 3, 1977, p. 146.

^④ Juan Velasco Alvarado, “The Master Will No Longer Feed off your Poverty”, in Orin Starn, Carlos Iván Degregori, and Robin Kirk, *The Peru Reader: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4–269.

拉斯科认为旧的教育制度没有创造充足的教育机会，导致土著人始终对国家具有疏离感，政府应该对教育进行根本的变革，通过教育实现整合土著人、消除社会歧视、建构民族认同的目标。^① 1971年，他在演讲中说，“革命政府将建立一种满足整个民族需要的教育体制，它将塑造具有民族意识的公民。”1972年，官方颁布法令，宣布加强地方政府对各级教育的监管，实施由教师、学生家长和村社领导者共同参与的教育发展项目，培养以土著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模式。^② 此外，法令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西班牙语与克丘亚语进行双语教学。1976年，克丘亚语成为各阶段学生必须学习的语言，对于以克丘亚语为母语的土著人，则必须使用土著语言进行教学。^③

为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贝拉斯科政府强调尊重种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在克丘亚语获得国家认可之前，西班牙语是被规定在法庭和学校中使用的唯一语言。1976年，克丘亚语获得与西班牙语同等的法律地位，这使土著人无须在法庭中寻求他人的帮助就能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解决纠纷；在学校使用克丘亚语教学也充分尊重了绝大部分土著人的文化权利，减少了土著学生对接受教育的排斥心理。激进知识分子阿尔韦托·埃斯科瓦尔（Alberto Escobar）和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指出，克丘亚语的官方化有利于打破在文化领域对土著人的压迫机制。^④ 这项法令也使秘鲁成为拉美首个将原住民语言确立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贝拉斯科政府的上述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秘鲁社会内部的种族、传统、文化的二元分裂结构密切相关。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本国商业的发展，城市变得越发具有经济活力，而农村却不断走向衰落，这导致以农牧业为主的土著人濒临破产。与此同时，大庄园主并没有停止侵占土著村社的土地，在合法维权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土著人对克里奥尔人和梅斯

^① Tracy Lynne Devine, “Indigenous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in Peru: Indigenismo, Educ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in State Discourses”,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8, No. 1, 1999, pp. 63 - 74.

^② María Elena García, *Making Indigenous Citizens: Identities,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Per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5, pp. 75 - 83.

^③ Alberto Escobar, José Matos Mar, y Giorgio Alberti, *Perú: País Bilingüe?*,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75, pp. 61 - 63; Thomas Turino, “The State and Andean Musical Production in Peru”, in Greg Urban and Joel Sherzer, *Nation - States and Indians in Latin Americ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pp. 259 - 285.

^④ María Elena García, *Making Indigenous Citizens: Identities,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Per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5, p. 75.

蒂索人的敌视不断增强，土著农民运动由此兴起。贝拉斯科是在秘鲁的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白热化的历史时刻夺取政权的，他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打破阻碍秘鲁均衡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用“农民”取代“土著人”，用阶级话语取代种族主义话语，表面上是为整合土著人的革命民族主义政策，实则为掩盖长久以来的种族冲突的政治手段。由于官方不具实际效应的法令已经无法满足土著人的诉求，军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的土著主义立场，实行大规模的改革。然而，由于这些法令触动了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固有的政治经济利益，“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主流社会陷入恐慌，因而遭到越来越大的阻力。1975年，第二任军政府莫拉莱斯·贝穆德斯（Morales Bermúdez）放弃革命立场，土著主义开始淡出官方政治话语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森、托莱多和乌马拉在总统竞选中为了获得土著人的支持，均先后与其建立联盟关系。^①可实际上，他们在土著人的选票支持下获得政权后，并没有推出从根本上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位的政策措施，这促使土著人开始探索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方式，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

五 结语

秘鲁的土著主义是主张恢复土著传统文化、维护土著人权益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为应对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尖锐化的种族冲突的努力。

在迈向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过程中，秘鲁一开始就面临着种族、传统和文化的二元分裂问题。以从事农牧业为主的土著人长期生活在安第斯山区，保留了印加时期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使用区别于西班牙语的土著语言进行交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受西方文化熏陶，主要居住在城市，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在秘鲁发展出口经济、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趋势的同时，社会内部的结构矛盾日益显现，地主寡头精英对土著村社集体土地的长期蚕食，迫使被边缘化的土著人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抵抗运动。在笔者看来，秘

^① Raúl L. Madrid, “Ethnic Proximity and Ethnic Voting in Peru”,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3, No. 2, 2011, pp. 267–297.

鲁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实际上伴随着以种族主义为取向的激烈的社会冲突。

土著主义既是秘鲁知识分子为缓和种族矛盾的思想运动，又与执政者建构民族国家的官方话语相互交织。一方面，硝石战争的失败促使文化精英认识到，受到压制的土著人与掌权的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之间的冲突不仅削弱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也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隐患。另一方面，统治阶层意识到，要使秘鲁能够竞逐富强国家，首先要建构具有凝聚力的现代民族。由此，政府开始吸收在思想界不断发展的土著主义，先后通过教育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和将克丘亚语确立为官方语言的方式同化土著人。从思想层面上看，“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印加帝国的光辉成就与殖民地时期的残酷统治被刻意放大宣传，土著风俗传统成为整个国家需要加以保护的文化资源。

尽管将土著主义官方化是秘鲁政府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举措，但秘鲁社会内部的种族主义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克里奥尔人与梅斯蒂索人长期垄断政治、经济权力，土著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而是被执政者基于政治需要而刻意地放大或者忽视。因此，土著人与执政的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信任，这种不言明的种族主义为秘鲁社会的整体发展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责任编辑 王 帅)